

第一章 早期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的初步接触

一、容闳与中美文化的沟通

1. 留学源流略探

留学生一词是日本人创造的。唐朝时,中日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日本政府多次派“遣唐使”研究和吸收中国的先进文化。但“遣唐使”是外交使节,停留时间有限,影响了对中国文化系统而深入地学习。所以,日本政府从第二次派“遣唐使”时起,同时派来了“留学生”或“还学生”。“留学生”在“遣唐使”返国时继续留在中国学习,“还学生”则和“遣唐使”同来同归,但以学习为主。后来,“留学生”一词在中国被一直沿用下来。现在凡是留居国外学习的学生,统称“留学生”。但在清末,也有称“游洋生”、“游历生”、“洋学生”的。

宋、元、明时期,一方面中国处于全球先进行列,一方面对整个世界知之甚少,派人出国留学就无从谈起。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的侵略扩张,一些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自觉不自觉地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使中国人民对欧洲和世界有了某种了解。1584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广东肇庆刻印了《山海輿地全图》,这是中国人见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后来他又向皇帝贡献了《万国輿图》,中国人才有了早期三大洋、五大洲的不规范的世界概念。1623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刊印了《职

方外纪》，简明而全面地介绍了欧洲和世界的概貌，是中国人初步了解世界地理的启蒙读物。随着来华传教士的增加，中国人与他们的交往也多起来。一些传教士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吸引个别青年到欧洲留学。据有关史料记述，从1650年到1840年，赴欧留学的有一百多人。意大利在1732年还于那不勒斯设立了“中华书院”（亦名“圣家书院”），虽然也吸引土耳其、希腊的青年入学，但以教授中国学生为主。这些留学生主要学习耶稣教义、神学，兼及欧洲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如“格物穷理超性之学”。^① 他们毕业后，多数充当传教士，也有的流连忘返，混迹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上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毕竟打开了中国人海外留学的通路，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由书本转到实践，由“百闻”变为“一见”。他们当中的个别人还写过一些游记，译过几本书，在顽石的夹缝中流出了一道中西文化交融的涓涓细流。例如山西平阳的樊守义（又称守和、守利、诗义，字利如），25岁随西洋教士赴欧洲留学，到过巴西、葡萄牙、西班牙，但多数时间在意大利学习和考察，清康熙十三年（1720年）返回广州，后在承德受到了康熙皇帝的召见，“详询一切，乃著《身见录》以进”。^② 樊守义的这本《身见录》，是他欧洲留学时的游记，虽不翔实，但毕竟记述了西方一些情况，尤其对罗马的教堂和意大利的风情有较多的生动描绘，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它不仅增强了人们对欧洲的了解，也从另一侧面对利马窦的《万国舆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做了补充，打消了一些中国文人惧怕受艾儒略等人欺蒙的疑虑。再如北京的杨德望（1734～1787年）和高类思（1733～1787年），1751年一同往法国留学，学习法文、拉丁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同时钻研神学。他们勤奋好学，成绩优良，曾受到法国国务院的赞扬。后来，杨、高二位又学习铜版雕刻和西洋绘画，往里昂参观织布厂、金银制作公司和一些军火工厂。他们和法国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杜尔果（Turgot）颇有交往。热心研究中国问题的杜尔果希望二人回国后帮助他搜集中国的财富、耕作、土地分配、造纸、印刷、纺织、茶叶、陶土、地质等资料。杜尔果出版的

① 《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77、178页。

② 《方豪文录》，北平上智编译馆1948年版，第177、178页。

《中国问题集》等书,得益于杨、高二位的协助。高类思还用法文撰写了《论中国与中国文学科学之起源》的报告,长达482页,对法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1765年,杨、高二人归国时,法国国王向每人颁发了1200 铔奖金,并赠送了望远镜、显微镜、印刷机械、电气机械、金表和许多贵重书籍。这些东西被带回中国后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尚不清楚。但这确是早期中法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回味的事情,是中法人民友好情谊的象征。

其他留欧生也或多或少写过一点游记,译过某种教义,如一位姓康的青年曾用拉丁文作旅游诗,和欧人作品齐名;郭连城撰《西游笔略》,有一些影响;郭栋臣译《真福和德理传》,著《游记》,为人关注。但是,这些留欧青年基本是传教士的附庸,是被当做传教士在华的代言人而培养的,对清代前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没有太大的影响。特别是,清廷此时还闭关自守于东方,对西方文化并不渴求,更谈不上吸收。这种客观状况,使留欧青年不可能成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只能在教会门下打转转。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未派留学生出国,但东南沿海已出现了传教士开办的新式学堂,一些穷苦儿童入学就读,传教士在归国时也常顺便带一些青年出国留学。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可思想情趣与鸦片战争前的留欧学生不大相同。这些青年大都不愿做传教士的“接班人”,较注重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研究,并试图引进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文明富强之林。他们是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留学生,也是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容闳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2. 相互隔膜的中美文化

容闳赴美国留学是1847年。这时,古老的中国和年轻的美国还互不了解。

美国人何时知道有个中国存在,现在不得而知。但在美国抗英独立之前,中美没有任何直接往来,当时的中国茶叶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从广州运往伦敦再转运至美洲;美洲的人参等土产也是通过这种途径输入中国的。美国独立后,为对抗英国和发展经济,企求与中国贸易往来。但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情况多是从一些旅行者及东印

度公司的商人那里零星得到的,对中国存在着无知和偏见,认为中国人可笑又无法救药,是“长尾巴的天朝人”、“雨伞民族”、“未开化的‘猪眼’人民”。^①这无疑阻碍了美国人的来华步伐。

然而,美国人富于冒险精神,在1784年中美正式贸易往来之前,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曾来华探险。据可信史料,至少黎亚德(John Ledyard)和戈尔(John Gore)到过中国。黎亚德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人,大学毕业后随英人在太平洋各地探险,漫游过广州。返美后,讲述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但多数美国人不大相信。不过,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在一天天加深,逐步由神话传说变为现实需求。1783年,一些商界人士开始酝酿派轮船往中国做生意。于是,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轮船自纽约启航赴华,同年8月23日抵达中国^②,次年5月12日返回纽约。此次航行,大出美国人所料,竟获纯利近4万美国,利润高达25%。新闻报纸争相刊发这一消息,远航的报告也转到了美国国会。报告中讲:“虽然这是第一艘到中国的美国船,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最初他们尚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间的差别,视我们为‘新人’。当我们将美国地图视之,并告以疆域、人口的情形后,他们对今后土产出口可能大量增加一事,感觉十分高兴。”^③可见,美国人给中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有的美国议员还专门给总统写信,建议重视和扩大中美贸易。美国国会于1789年至1791年曾立法保护对华经济贸易。

中美贸易虽然打通,但美国没有一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书刊,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仍处于茫然状态。1818年,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杰佛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特别想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不能如愿。1825年,13岁的美国人亨特(Wiliam C. Hunter)来到中国。他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攻读中文,后从事商业活动,

①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② 关于该船抵华日期有两种说法,一为8月23日;一为8月25日;准确日期待考。“中国女皇号”载棉花361担,铅476担,胡椒26担,羽纱1270匹,皮货2600件,人参473担;返回时,运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

③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1783—1789*,第3卷,第761页。

能讲汉语和用中文写作,这是真正懂汉语的第一位美国人。但他并未写出什么著作。1834年,美国商人出于好奇,从广东买了一位小脚妇女运至美国,美国人争看“三寸金莲”,这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也反映出美国人对中国风俗文化的无知。直到1838年,当时美国哲学会会长杜彭书(Peter S. Du Ponceau)经过努力,才出版了《中国文字之性质及其特征》一书。但他根本没有读过中文书,资料主要来源于欧洲人的报告和著述,所以该书仅是生搬硬套地粗略介绍而已。真正有一定水平来介绍中国文化的是早期来华的传教士。

182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gah Coleman Bridgman)启程来华,途中遇到了亨特,亨特成了他的中文启蒙老师,这为裨治文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他到广州后,一面行医,一面办起了英文书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世故,还翻译一些中国私塾的教科书,这无疑成了美国和其他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不过,《中国丛报》介绍的内容还是十分粗浅的,例如第11期刊登的介绍《红楼梦》的文章,把该书归结为“琐碎无聊之谈”,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实在是太荒唐了。但是裨治文从传教的目的出发,了解中国的热情很高。1841年,他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长达728页,用中英两种文字相互注解,简明易懂,对沟通中英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① 1842年,在裨治文的努力下,成立了美国东方协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以研究中国为宗旨。后来,英国皇家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分会成立,裨治文也参与其中。鸦片战争时期,裨治文是美国人来中国探险的重要人物,他出版的《广州市及其商业介绍》,是美国人关于广州情况的最早著作之一。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较裨治文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1833年来华,在美国公理会创办的印刷所当工人,学会了中文和日文,注意搜集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资料。1844年出版了《中国地志》,简略地叙述了中国的地理分布。1848年出版了《中国总论》,

^① 该书分17目:1. 绪论;2. 中文;3. 身体;4. 亲属;5. 各等人物;6. 家庭;7. 商务;8. 机械;9. 建筑;10. 农业;11. 文科课目;12. 数学;13. 地理;14. 矿物;15. 动物;16. 医药;17. 政事。

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民情、日常生活、人口、文学艺术等都做了概括的叙述,还附有“中华帝国地图”,是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还曾返回美国做过一百多次的演讲,形象地传播中国的民情风貌和古典文化。他撰著的《中国缀音字典》,收字 12,527 个,对中英文的相互转换有很好的功用。晚年,卫三畏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为中文教授,成为在美国讲授中文课程的第一人。直到 1879 年,哈佛大学才通过特殊途径聘请中国宁波人戈鲲化任中文讲师。《哈佛纪事》(*Harvard Register*)记称:戈鲲化“是他所隶属的古老国家以及我们所属的新兴国家间的一种秘奥的联结”。很可惜,戈鲲化三年后就谢世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又有华人在哈佛大学讲授中文。

由此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后数十年间,美国人虽然对中国文化有所涉猎,但仍是隔着云雾观景,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也大体如此。

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最早关于美国的记载是谢清高的《海录》。谢是广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人,自 1782 年起,18 岁的谢清高就随外国船只漂洋过海,后因双目失明,返归广东,结束了风风雨雨的颠簸生涯。1820 年,杨炳南在澳门遇到了谢清高,据谢的口述整理成《海录》一书,涉猎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书中把今天的南洋群岛称为“南海”;把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岛称“西北海”;将欧洲、美洲、非洲称“西南海”;将美国称曰“芋里干国”,其云:

“芋里干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西行,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其国出入多用火船,内外俱用轮辅,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自行驶,其制巧妙,莫可得窥。小西洋诸国,亦多效之矣。自大西洋至芋里干,统谓之大西洋,多尚奇技淫巧,以海舶贸易为生,自王至于庶人,无二妻者。山多奇禽怪兽,莫知其名。”

这些记述大体是准确的。至少向人们展示了三:一、美国的地理位置;二、使用蒸汽机的轮船的情况;三、部分风土习俗和某些历史沿革。书中把美国写做“芋里干”,后为一般中国人所接受。鸦片战争前后,一般平民

大致称美国为“芋里干”、“米利坚”、“米里干”、“花旗”、“亚墨里驾花旗”等名。

19世纪30年代,关于美国的记述有所增多,不下十余种,虽多简略,但反映了中美逐步接近的趋向。叶钟进在1834年写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还顺便介绍了美国,其中讲:“美利坚即中国所称花旗者。沃野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其人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美国夷常指英夷为山狗性。”^①可见,早期中国人对美国有良好的印象,对英国则很不以为然。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历史发生了转折。“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②与此同时,先进的中国人急欲了解世界。他们在重点研究英国时,也对美国予以关注,使早期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深入了一步。1842年,林则徐主持编辑了《四洲志》,^③其中关于美国的部分有两万多言,甚至讲到了美国的议会制,认为美国凡“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必须由议会决定“而后行”。“设所见不同,则三占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询谋佥同。”而且有惯例,总统“四年为一任,期满变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④林则徐记述这些情况可能没有什么用意,如果有,实在值得回味。魏源的不朽名著《海国图志》,也有相当的篇幅涉猎美国,而且画有草图。在魏源眼里,美国一是“富”,“每年物产及制造货件,共银一万一千万元,可观其国丰盛矣”;二是“强”,“其水师武备甚善,屡与英国交锋获胜”;三是“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⑤美国简直成了魏源

① 转见魏源:《海国图志》,清光绪二年(1876年)甘肃刻本,卷五十二。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页。

③ 《四洲志》是林则徐请袁德辉等人将幕瑞(Murray)所著《地理大全》译编而成,实际讲五大洲的事情,之所以名为《四洲志》,是沿袭佛经的传统说法。

④ 见《四洲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⑤ 以上引文见《海国图志》卷六十一、卷六十、卷五十九。

理想中的“西土桃花源”。较《海国图志》稍后出版的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对美国做了如下叙述：

“米利坚(米一作尔,即亚墨利加之转音。或作美利哥,一称亚墨利驾合众国,又称兼摄邦国,又称联邦国,西语名育奈士达。)亚墨利加,大国也,因其船挂花旗,故粤东呼为花旗国(花旗方幅,红白相间,右角另一小方黑色,上以白点绘北斗形)。北界英土,南界墨西哥得撒,东据大西洋海,西据大洋海,东西约万里,南北阔处五六千里,狭处三四千里。押罢拉既俺大山环其东,落机大山绕其西,中间数千里大势低平,江河以密失比为纲领,来源甚远,曲折万余里,会密苏尔厘大河南流入海。此外名水,曰哥隆比亚、曰阿巴拉尔、曰密执安。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今于位之总统领勿尔吉尼亚国所推也。初华盛顿既与英人平,销兵罢战,事务农商,下令曰:‘自今以往,各统领有贪图别国埔头,腴削民膏,兴兵构恐者,众其诛之。’留战舰二十,额兵万人而已。然疆土恢阔,储峙丰饶,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大国与之辑睦,无敢欺侮之者。”^①

这种描述,较鸦片战争以前要详细和准确多了。令人惊叹的是,徐继畲对华盛顿崇拜之至: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赅赅乎三代之遗志!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伟绝伦。呜呼,可不谓人主矣哉!”^②

这里把华盛顿比做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曹操、刘备,认为他实现了中国人向往的“天下为公”的美妙社会蓝图,徐继畲的思想情绪是深沉和意味非常的。特别在鸦片战争时期那种特定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和美国缺乏起码的知识,徐继畲这种介绍就具有开阔视野的启蒙作用。

但是,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一不懂英语,二无法出国,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外人办的一些报刊杂志、传教士的口述,以及少量的图书。其中

^① 《瀛环志略》,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福州刻本,卷九。

^② 《瀛环志略》,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福州刻本,卷九。

半是猎奇,半是臆测,片面和不准确是难免的。这也是中国人认识世界必经的一步。不过,鸦片战争时期,也有个别人由于偶然的机会,踏上了新大陆,留下记述的仅有林鍼的《西海纪游草》。林是福建厦门人,家境贫寒,较早学会了英语,在洋行充翻译谋生,1847年受聘赴美工作,1849年返回故土。他在美国不仅接触了达官贵人,而且和一般下层贫民交朋友,甚至和妙龄少女有较多的富有情趣的来往。所以,《西海纪游草》对美国社会的记录形象而富有生活气息,涉及美国的政治、经济、风土、人情、等级差异等许多方面,也对华盛顿和美国社会有一些评论。然而,林鍼文化水准低,眼光也不敏锐,《西海纪游草》在中美文化交往史上并未起到里程碑的功用。

综而观之,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几十年中,中美少数仁人志士曾千方百计相互介绍过美国和中国的一些情况,但基本处于“瞎子摸象”的阶段,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连完整的概念还未形成,中美文化仍处于相互隔膜状态。时人评论清廷的“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①中美在1844年已订立了《望厦条约》,但道光皇帝还怀疑世界上有一个美国存在,让大臣去查一下“是否确实”。^②这种无知状态,有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更有害于对外交往和反抗资本主义的侵略。所以沟通中美文化是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的一个大问题。贫寒子弟容闳的赴美留学,就成为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

3. “流浪儿”赴美留学

容闳(1828~1912年),字达萌,号纯甫,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镇人。他出生在清廷走向衰亡、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大变动年代。一方面,清政府政治动乱,阶级矛盾尖锐,经济衰退,军事废弛,思想文化一蹶不振,整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昏惨惨似灯将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了中国,日增一日的鸦片贸易使清廷白银外流,财政空虚,民众的身心遭受摧残,大批官吏腐化堕落,鸦片的毒流支解着清廷,窒息着中华

① 《澳门新闻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41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四,第2921页。

民族的生机。龚自珍的“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鱼米之乡的南屏镇，也很少有“稻香秋雨后，蚕语夜声稀”，“牧童村外笛，驱犊下黄昏”的升平景象，^①多数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无权无势的容家更是如此。

容闳家一共6口人，父亲靠着勤劳的双手务农为生，母亲是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农家女子，还有姐姐、哥哥和弟弟。容闳的哥哥长大成人后，本可以助父亲一臂之力，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还是被送往私塾读书。容闳7岁时，为了给他安排一个锦绣前程，父亲决定送他进外国人办的洋学堂。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广东沿海有些人充当他们的“通事”、“中间人”或“买卖人”（即早期的买办），这些人往往成为“暴发户”，转眼间千金“赤手可致”，容闳父亲非常“眼馋”，希望容闳能走这条道，发大财。而且，离南屏镇不远的澳门，德国传教士郭士立（Gutzlaff）的夫人已经于1834年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专招女子入学。1835年，为了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传教“业绩”，^②又开设了男生部，作为将来开办正规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班。于是容闳父亲通过本村一位在该校作工的朋友的关系，将容闳送进了教会学校。从此，容闳每天念圣经，背英文，走着与哥哥完全不同的道路。

天有不测风云。1838年，澳门教会学校因经费不足停办。容闳回家务农。两年后，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其父不幸病逝。容家顶梁柱折了，生活极度困难。容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迨1840年夏秋之交，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龄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往来于本乡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天清晨三时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两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家中支柱，惟长兄是赖耳。予母得

① 申良翰编：《香山县志》卷八。

② 马礼逊（1782～1834年），英国传教士，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鼻祖。1807年8月到达广州，学习中国语言，并采用华人生活方式。1809年后的二十五年间，一面行医传教，一面任职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时参与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他将基督圣经译成了中文，1814年出版《新约全书》，1819年出版《新旧约全书》，后又出版了《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予姊恒与予偕。”^①提篮小卖、打草、拾稻穗,容闳过着一种衣食不足、近似“流浪儿”的生活,邻居出于同情心,常送一点稻谷给他们。

1839年11月,马礼逊学校正式在澳门兴办,主持校务的是美国传教士布朗(Rev. S. R. Brown)。布朗1823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1839年携夫人来澳门传教,对办学很热心,先后招收黄胜、黄宽、李刚、周文、唐杰等人入学。容闳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心想再去学习。1841年其母不得已送他往马礼逊学校。一位外国人记称:“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再待些时候,学点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②

1842年,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的一座小山上,学生也增至近40人,分三班上课,开设英文、中文、算术、地理等课程。布朗等人教学认真,方法灵活,温和有礼,“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③容闳英文基础好,又聪慧好学,是班里的高材生,深受布朗喜爱。经过六年的学习,容闳不仅英文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求知欲望日甚一日。恰在这时,布朗夫妇由于身体不好,决定回国,出于对这批学生的情感以及培养教徒的目的,想带三五名学生赴美,在教会资助下继续完成学业。布朗向学生表明这一意图后,多数学生沉默不语,只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人报了名,但却遭到家长们的反对,容闳多次向母亲请求,才勉强得到允许。

1847年1月4日,容闳三人乘纽约奥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来华运茶的“亨特利思号”(Huntress)商船,由广州黄埔港启航,驶往美国。他们经印度洋,过好望角,入大西洋,然后北上至纽约。时值寒冬,风狂浪猛,旅途之苦自不待言。然而,年方19的容闳精力充沛,好奇心强,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此据岳麓书社合订本,第44页。

② 参见 H. N.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③ 《西学东渐记》,第48页。

把海上的困苦颠簸视为“不世之奇观”。98天之后(1847年4月12日),他们抵达纽约,面对繁华的街道、热闹的人群,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三人在布朗先生家小住一周,即往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

孟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当时美国尚没有高中,凡准备升入大学者均在这类学校学习。学校设有数学、文法、生理、心理学、哲学等课。校长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又是新英国省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对英国文学,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颇有研究,注重教学法,善于演讲,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把孟松学校办得很有生气,成为新英国省最有名望的一所中学。海门校长对容闳三人热情有礼,教导有方,亲自讲授英国文学,指导他们读英国作家文集,容闳后来酷爱英国文学,颇受海门的影响。容闳三人学习也非常刻苦。为了克服经费不足的困难,他们一般自己做饭,并在上学之余去做小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挣点零用钱。留学生活艰苦而紧张。

一年过后,同行三人中的黄胜突然病倒,无法坚持学习,只好提前回国。传教士原定资助他们两年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必须设法筹备1849年之后的留学经费。容闳和黄宽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布朗和海门。经布朗和海门与香港有关人士联系,答应二人从孟松学校结业后,资助他们往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专科。黄宽欣喜愿往,但容闳不感兴趣。他想学习农业化学,特别期望进入耶鲁大学深造,但香港有关人士则不予资助。直到1850年春天,经费还没有着落。布朗、海门希望他将来做传教士,这样教会可以给钱。容闳反复思考,认为这样做无法实现他将来改造中国的宏图大志,便谢绝了。1850年夏,经布朗的多方努力,乔治亚州的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同意资助容闳上学。于是,经过严格考试,容闳进入了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创建于1701年,设备完善,藏书丰富,师资力量雄厚,课程安排比较系统。容闳一则缺少各方面的专门训练,二则妇女会资助经费有限,还得去做小工,学习上很吃力。刚入校时,他每天读书至深夜,致使身体衰弱,被迫休息一周。平均分数勉强及格。耶鲁大学的计分法以平均“2”为及格,“3”为荣誉级,容闳第一学期总平均仅“2.12”。升入二年级后,容闳的

功课依旧不好,尤其是微积分,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幸亏英文成绩好,这样一平均,还能过关。容闳十分爱好体育,特别喜欢踢足球。常参加一二年级的足球比赛,人称其“穿老旧衣服,头戴一高草帽紧压其盘卷的辫子,在球场奔驰,竟成为传奇式的足球英雄”。^① 三年级时,容闳学习入了点门,英文成绩连获首奖,同学为之侧目。一位美国朋友在 1914 年回忆说:“六十余年前……与容纯甫同学,容异服异俗,颇受人笑,其年容两得班中英文第一奖品,其后无敢揶揄之者矣。”^②但容闳并不敢沾沾自喜,因那门讨厌的微积分仍没有过关,经费困难又时时袭来。为此,容闳一方面在数学上下苦功,一方面积极在学校谋求职业。第三学年时,高年级同学二三十人自办伙食,容闳自告奋勇任司务长,负责采购等事宜,赚得几元钱,解决了饭费。学生社团兄弟会成立后,开设了图书室,容闳自荐当图书管理员,每月收入 30 元,既解决了后顾之忧,又有机会博览群书。1854 年毕业时,容闳各门功课都取得了较好成绩,获文学学士学位。1876 年耶鲁大学又授予他法学博士,成为中国受过美国系统高等教育的第一人。

容闳毕业前夕,曾在该校新设的雪费尔专门学院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学习测量,兴趣日增。他本想继续学习,但经费无法解决,又思念阔别多年的祖国和亲人,便于 1854 年 11 月 13 日由纽约乘船回国。

4. 彻底开放的文化观

容闳赴美留学恰值 19 岁到 26 岁的风华正茂时期,这是一个人世界观形成的关键阶段。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容闳开放的文化观正是由他特殊的社会经历所决定的。他从启蒙到中学、大学,受的是系统完整的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的文学、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新型的自然科学他都认真学习过。容闳是 19 世纪中期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中国人,而且他反对鹦鹉学舌,强调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如果留学仅是学习语言,猎取异闻,那“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有

① 《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传记文学》第 16 卷,第 6 期。

② 《胡适留学日记》,1914 年 5 月 15 日记。

灵性之鸚鵡耳,曷足貴哉!”^①因而,他在留學期間善于思考,注重吸收,即使是化學實驗也往往將他帶入一個嶄新的世界,遐想萬千。容闳不僅有豐富的書本知識,而且耳聞目睹了美國的社会、經濟生活和人情風俗,具有一般中國人所沒有的社會實踐。儘管容闳留美時忙于學習,沒有什麼政治活動,但美國的政治文化生活、深入人心的《人權宣言》和《黑奴解放令》等不可能不對容闳發生影響。在美國式的資產階級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感染下,他自然形成了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新的文化主張。容闳一生始終把美國式的社會看做最理想的社會,把美國視做梦寐以求的天堂。他在馬禮遜學校寫的作文《憶想中之紐約游》,發揮全部想象將紐約描繪成人間天堂一般;他逝世前寫給孫中山的信,熱情洋溢地希望在中國建立一個美國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容闳在表述自己志向時指出:“以西方之學術灌輸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汲西方文明之學術以改良東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國,一變為少年新中國。”^②這種“西化”的文化政治主張,是非常開放的,具體包括三個層次:

其一、用“西化”實現救國宿願。

容闳主張全面開放的根本目的是改造中國,為民眾謀幸福。1852年,他加入了美國籍,但一心想的還是如何學一門祖國最需要的專業。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住到1854年夏,我將獲得文學士學位。此后我將考慮回國,並且仔細考慮將來的職業。談到職業,我還沒有一定的結論。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我將來要學習農業化學,我也許去學習內科和外科醫學。有那麼多東西,而且每一種都對想為祖國謀福利的人那樣地具有價值,以致要想知道應該選擇哪一種是實在太困難了。”^③容闳由美歸國之舉,更表明了他獻身祖國的政治追求。他的好友特韋契耳(Joseph H. Twichell)寫道:“他居留美國已久,具備徹底歸化的資格……而且,由于他的畢業引起人們的注意,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機會向他開放了:只要他樂意,他可以留在美國並找到職業。另一方面,對他來說,中國反倒像異鄉。他連本國語言也幾乎忘光

① 《西學東漸記》,第18頁。

② 《西學東漸記》,第62頁。

③ 《1852年12月30日容闳致衛三畏函》,原件藏耶魯大學圖書館。

了。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由于考虑到他在哪里待过,成了什么人和想干什么,他在本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猜疑和敌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①这种评论是客观而中肯的,容闳放弃了在美国工作的机会,选择的是极艰难的道路。但在他看来:“予之生于斯世,既非为哺饷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人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②容闳后来的行动,基本实现了他的誓愿。近代进步的政治运动,如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和他有这样那样的关系,他几乎是一位与中国近代政治变革相始终的人物。他的“西化”是和近代中国的进步紧紧结合在一起的。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拜会了年已75岁的容闳,长谈两个多小时,容闳“策国家之将来,示党论之方针,条理秩然,使人钦佩”。他“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③1912年,躺在病床上的容闳接到孙中山请他归国支援南京临时政府的来信,激动不已,自己无法远行,强令儿子归国。容闳的心和祖国一起跳动,他以“西化”为手段,欲达振兴中华之目的。

其二,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

容闳的政治理想是将中国“化”为第二个美国。他多以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文化取向为是非标准。他看到了中国解除外国资本主义压迫,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迫切性;认识到清廷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求得美国等国资金、技术援助,开发自然资源,加速建成新型工业体系的必要性;同时将清廷和美国相比较,意识到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不变革,中国亡在旦夕。他在大学毕业前夕曾这样写道:“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逐觉此身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

① 《西学东渐记》附录,第165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74页。

③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时代,转不知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①容闳受美国文化感染愈深,愈感清廷问题严重,愈觉中国人生活痛苦,愈想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这是中美文化差异在容闳思想深处的一种反映,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认识。从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出发,他对两广总督叶名琛击杀太平军极为不满,夜不能寐;根据自由平等的观念,他认为太平军起义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曾国藩的湘军则残暴无比,毫无人性。容闳在政治上曾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新型政府,在中国具有开创意义。在经济上,他引进美国的科学技术,修铁路,建银行,组建轮船公司,呼吁开发长江,努力兴建厂矿企业,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文化教育上,他筹建新式学堂,办报纸,译西书,为传播西方文化全力奔走。在军事上,他提出建立近代化的海军、陆军,兴办海军学校,加强国防。容闳还支持戊戌变法,他在北京金顶庙的住所,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经常出没的地方。1900年,他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国会,并出任会长。所有这一切,容闳多是从美国搬来的。他是中国近代少有的美国通,也是从思想到行动传播美国文化的第一人。李鸿章认为容闳“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②早年他用英文写的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译成中文时名为《西学东渐记》),形象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理想和活动。后来人们用“西学东渐”一词来表达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一直沿用至今。

其三,以留学教育培养人才。

容闳实施其政治思想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是选择优秀青年赴美留学,造就人才。按照容闳的逻辑:他是赴美受过高等教育之人,可以将美国文化输入中国,救亡图存;别人也能按同样的方法,到美国留学,成为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的新人;如此下去,赴美留学的人越多,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越广,中国“美国化”的程度就越高,逐渐就会使中国像美国那样繁荣富强。所以,容闳把促进留学教育当成中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竭诚为之奋斗。他认为留美教育“为中国复兴希望之所系,亦即予苦心

^① 《西学东渐记》,第61页。

^② 《论派员办秘鲁华工》,《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二。

孤诣以从事者也”。^①由此可见,容闳是一位较典型的“教育救国”论者。他试图用留美青年来沟通和融合大洋两岸相互隔膜的中美文化,最后达到西方文化灌输于东方的目的。在19世纪50年代,这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大胆设想,是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一种表现。但是,要“教育救国”,必须有一个开明的奋发向上的、有能力的政府做保证,靠清廷这样一个腐败没落的政权去“教育救国”,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近代中国的“教育救国”论者,多具有悲剧色彩。容闳的“留美教育”计划也难逃这种厄运。

5. 致力于派留美生

容闳具有坚强的毅力,他“留美教育计划”确立后,便全力为之奋斗。但是,中国的客观现实和他的“计划”发生了矛盾。19世纪50年代的清廷不求变革,压制人才,绝大多数清朝官吏缺少新知,夜郎自大,抱守孔孟伦常,坚持以“义理”治天下。他们视学习西方为“以夷变夏”,斥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奇技淫巧”,至于派人出国留学,拜洋人做老师,那更是大逆不道。这种状况注定了容闳到处碰壁。

1855年,他在广州找到美国代理驻华公使伯驾,企图通过他结识中国上层官僚,派留学生出国,结果失败;

同年,容宏又前往香港,希望会见清廷要员,支持其“教育计划”,结果失败;

1856年,他跑到上海海关,想找到清朝权贵,结果失败;

1857年,他仍在上海一面译书,一面企图通过一些社会名流去结交清朝重臣,结果又是失败;

1860年,他潜入南京,希望借助太平天国实施其“教育计划”,结果还是失败。

多次失败使容闳产生通过经商致富,再自派留学生出国的想法。从1861年开始,他在九江做起了茶叶商。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像容闳这样一无封建官吏做靠山,二少洋行买办来保护的人,想经商致富谈何容

^① 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

易。容闳经商的过程实际上是逐步破产的过程。1863年,他对“留美教育计划”的实施简直有点绝望了。

恰在这时,曾国藩的幕僚致书容闳,说曾邀请他到安庆,“亟思一见”。

曾国藩邀请容闳完全出于洋务事业的需要。曾国藩在借助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认识了西方资本主义洋枪洋炮的威力,产生了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兴办以军事企业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的洋务思想。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他就极力鼓吹洋务事业,并于1862年办起了安庆军械所,制造枪支弹药。此后,他和李鸿章一起,准备在上海修建一个大兵工厂,但因机器缺乏而难以上马。在当时清朝大多数官吏闭目塞听的情况下,很难找到一个合适人选出国采购机器。容闳在上海译书过程中所结识的几个社会名流后来都投到了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听说容闳在美国多年、见识广、朋友多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赴美采购机器的人才,便设法罗致。

但容闳对充当这种采买商并不感兴趣,他去见曾国藩的目的仍是希望曾帮助他派留学生出国。当曾国藩派他赴美购买机器时,为了不得罪曾,并取得曾的欢心,以便争取他同意自己的“教育计划”,容闳才不辞辛苦,奔赴美国。机器买回后,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开业了。容闳替曾国藩解决了一大难题,博得了曾的信任。1867年,容闳建议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附近设立兵工学校,曾欣然同意。这所学校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科学技术人才,翻译了西方一些科技书籍。容闳后来兴奋地回忆说:“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①随后,容闳大胆地拿出了其派遣留美生的“教育计划”。

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共有四项建议,中心是应该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以选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

^① 《西学东渐记》,第121页。

往,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总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之。”^①

容闳在这里将派留学生的目的、人数、方法、管理、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设想到了,比较切实可行。条陈写好后,由丁日昌寄给协办大学士、户部左侍郎文祥转奏。不料文祥丁忧回籍,条陈石沉大海。

容闳并不灰心。1870年曾国藩往天津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同行。在此期间,容闳几次鼓动丁日昌去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国藩终于同意了容闳的主张,并答应立即和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政府旨准。容闳“闻此消息,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忘其为偃卧床第间”。^②

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答应容闳的请求,原因有二:

第一,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清政府急需一批善于和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央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与列强有关的事宜,并在北京开设同文馆,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在广州也设立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讲解各国社会情形,以迅速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但这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同时,同文馆的学生要学习八年才能毕业,他们只是从书本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外交事务,往往笑话百出。因此,派一批留学生出国,成为解决外交人员急需的必要措施。

第二,随着曾国藩、李鸿章各种工厂企业的兴办,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他们在联名上清廷的奏折中说:“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善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教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③曾、李在这里把掌握西方技术看做其洋务工业发展的“身心性命”,而且相信通过派留学生可以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

^① 《西学东渐记》,第122页。

^② 《西学东渐记》,第125~126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153页。

办外交和办工厂企业等洋务事业的需要,将派遣留学生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来。可以说,洋务运动是派遣留学生的产婆,而容闳则起到了助产的作用。

此外,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于对外交涉的需要,个别人已涉足海外,闭目塞听的情况稍有改观。1866年,63岁的斌春带领其子和同文馆3名学生,由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做向导,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丹麦、瑞典、芬兰、俄国、普鲁士、汉诺威、比利时等,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位旗人归国后,对北京上层社会的许多官吏起了“洗脑”的作用。1868年,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孙家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等人,在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的协助下,出访美、英、法、普、俄等国。中国龙旗第一次在美国土地上飘扬。^①而且还和美国订立了《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其中第四条规定:“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国人民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第七条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②这为留美生的派遣提供了条约根据。与此同时,中美文化交流也渐有开拓。1867年春,美国国会向中国提供了50份“官方文件”,作为资料交流。1868年,美国向清廷赠送了豆类、蔬菜以及各种谷物的种籽,并要求与清政府交换。此后,美政府又希望中国提供税收、户籍、人口等方面的资料。对于美国的要求和“赠礼”,清廷颇怀疑虑,但1860年还是以“薄来厚往”的原则,由总理衙门回赠美国花种50种,五谷菜16种,中国书籍10种。这些书是:《皇清经解》、《钦定三礼》、《性理大全》、《五礼通考》、《本草纲目》、《针灸大成》、《医宗金鉴》、《骈字类编》、《梅氏丛书》、《农政全书》。上述图书共934卷,大致为儒家经典、医药科技和文化典籍三类,每部书的卷数虽然不齐全,但仍为美国“赠礼”的数倍,至今还珍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这对留美生的派出无疑会有帮助。

① 龙旗为黄色,3米多宽,四周镶蓝色边,中有巨龙飞舞。

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263、362页。

李鸿章等人接受容闳的主张,也受到了日本的某种影响。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所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加紧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明治元年,海外留学有五十人;二年,至百五十人;至五年,大抵千余人”。后来日本统治者“大率从外国学校归来者也”,对此,李鸿章很有感触,他说:“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①显然,李鸿章已把日本的经验作为他倡导派人出国学习的根据之一。

总之,派遣留美生是容闳的主观努力和当时的客观形势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1870年冬,清政府正式旨准了曾国藩、李鸿章关于派留美生的奏折。1871年8月,曾、李又联合上奏,进一步强调了派人出国留学的意义,并制定了具体章程12条,择其要者:

1. 与美国政府联系,允许中国派幼童入美国学校学习。经费由清廷支付。
2. 在上海设留学出洋局,派专人负责,挑选出洋幼童先在该局进行训练,准备出国。
3. 幼童年龄在十二三岁左右,计划先派一百二十名,分四年派出,留学期限十五年。
4. 幼童所学专业由清廷决定,归国后也由政府录用。
5. 幼童赴美后要兼习中文,听从指挥。
6. 留学经费共需库平银一百二十万两。

1872年2月,曾、李又一次上奏清廷,进一步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确定了有关负责人,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曾恒志为翻译,叶源瀚为出洋中文教习,幼童在上海的出国前训练由刘瀚清主持。

至此,留美生的派遣总算有了眉目,容闳奋斗十几年的“教育计划”有了变为现实的可能。这不仅决定了容闳的历史地位,也在近代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

二、留美幼童与中美文化冲突

1. 文化差异与派留学生的困难

派遣留美学生的经费、章程和具体步骤确定之后,余下的一个最大困难是招生。

19世纪70年代,虽然中外交往增多,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世界。如果把儿子送往遥远陌生的地方留学,是不可思议的。一位留美幼童这样回忆道:“那时的中国闭关自守,对世界事务一无所知。高级官吏认为西方教育会对其社会起破坏作用,所以根本提不到议程上来。此外通过几万里的海洋将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最后将没有人能安全到达。尤其在农村,对外界了解很少,没有学生敢出国。”^①另一位留美幼童也回忆说:“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消。”^②保守的传统文化观念,为选派留美幼童设置了重重障碍。

另外,那时中国知识界注重的是“四书五经”等封建经典,向往的是中举人、进士,当朝一品,耀祖光宗,对于出国读“洋书”不屑一顾。这种状况即使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没有完全改变。严复出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校长时已颇有名气,还四次去考进士。河南《长葛县志》记云:“清末废科学,设学堂,当时风气不开,思想守旧,凡士之考入学堂者,人竞不之齿,或有出洋留学者,则更斥为非类。”^③由此看来,出洋留学为中国封建的思想意识所不容,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挑战。

① *The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Under Dr. Yung Wing, 1872—1881*, 1932年天津出版,第3页。

② 刘真主编:《留学教育》,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1册,第83页。

③ 《长葛县志》卷七,政务志。